

古籍修复:传统技艺的现代变革

■本报记者 张文静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隐藏在幕后的文物修复师等职业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图书馆里,还有一群人正承担着为中华古籍“治病”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传统的技艺正在进行着新旧传承和与科技手段的融合。

会说话的文物

“不少人认为古籍就是一本,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会说话的文物。”提到古籍的意义,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说道,“古籍里面的文字可以直接、明确地告诉你中国人的智慧、成就以及中国的历史,它是炎黄子孙的共同记忆。”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书籍作为文明的标志,也与中国文明社会一道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书籍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至今,古籍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西域出土的不少珍贵文书,就为人们了解当时西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切实的史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介绍说,“如研究于阗地区税制的最好文书就是贞元六年全年的税账,足有一米多长。过去日本学者说西域没有税制,但我们的文书上用汉字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收税的一笔一笔账。这类文书展现了西域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的状态。我们现在研究丝绸之路,谈‘一带一路’,这些文书就是最好的材料。”

在刘家真看来,古籍里面扎着中华民族的根,保护古籍就是保护全球华人的记忆,也是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但是中华古籍历史悠久,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所以,对古籍的保护和修复也一直在持续着。

史料记载,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就已有书籍修复人员。宋代时,书籍的装订人员被称为“裱糊匠”“装背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几家图书馆有专门的修复部门。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古籍修复部门就是一家“百年老店”,从1918年组建古籍修复室至今,古籍修复工作已有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图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古籍修复工作,包括1991年启动的“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工作,2002年初启动的《永乐大典》修复与保护工程,2004年开始的对120多册(件)西夏文献的修复工作和2013年启动的“天禄琳琅”的修复工程。

当老师傅遇到年轻人

国图古籍馆的古籍修复师郭志新正在修复的就是“天禄琳琅”项目中的《元秘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天禄琳琅”是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称,汇聚宋、元、明时代珍籍善本,是中国古籍中的奇珍。由于该批书籍传世久远,入藏前又有部分书籍曾被水浸、火灼等,书籍中存在着严重的纸张糟朽、絮化、粘连、原装装帧解体等问题。

古籍修复是个连续性很强的工作,每个环节的衔接都非常重要。比如,刚在纸张上喷完水,就要趁着潮湿赶紧抚平、粘帖,一旦水分挥发了,纸张就皱了,就需要再次喷水,这样会对古籍造成二次伤害。所以,郭志新的工作需要很强的专注力,每天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少起身。

七年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郭志新来到国图工作,在此之前,她对古籍修复具体技巧一无所知。郭志新的技术完全是从她的师傅、古籍修复专家、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的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那里学到的。与杜伟生43年的从业时间相比,郭志新还算个新人。

在国图,专门的古籍修复师现在有19位,已经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这其中包括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也有刚入行一两年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的修复机器。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正在修复古籍。 张文静摄

的年轻人。国图的古籍修复室就是他们的“战场”,那里摆放着几张宽大的办公桌,桌上放着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毛笔、剪刀等工具,这些都是他们的“武器”。

过去,在古籍修复这一行,老师傅带几个小徒弟手把手地教,是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杜伟生自己也是这样学手艺的。如今,已经有了八位徒弟的杜伟生,师与徒的关系已与原来不同。

“对于古籍修复这样的手工艺活来说,师傅带的形式仍有生命力。老师傅的学历不是很高,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年轻人则毕业于美术史、化学、汉语言文学等不同专业,在纸张成分分析、修复色彩配比、临摹等方面更能发挥专业优势。所以,现在国图师傅带的形式也与以往不同了,年轻人在继承老师傅修复技巧和经验的同时,也与师傅一起做实验、研发设备。”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

对于自己的古籍修复工作,杜伟生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

么多年来,我修复过的《敦煌遗书》和《西夏说法图》应该说是难度最高的。《西夏说法图》底下有一个小卷,时间长了磨损后卷起来了,稍微不注意,一动就碎,仅仅是打开那个卷,我就用了一个星期。古籍的纸张品类特别多,即使是一个厂家出的,不同季节出的纸都不一样。一旦不小心,就对古籍造成了损害,所以修复一定要加倍小心。”

这种耐心细致的工匠精神也是年轻人从老师傅那里继承的宝贵财富。“老师傅们让我们看到,古籍修复首先要把书籍当成有生命的病人,要抱有极大的耐心。可能年轻人在修复辅助工具的使用上、对仪器设备的操作上比老师傅熟练,但老师傅的修复技术和敬业精神,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郭志新说。

经验与科技相融合

古籍修复是个古老的手艺,有些古人的修复方法,我们现在仍在使用。比如,北魏贾思勰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走过十年

■本报记者 张文静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作为一项国家级文化保护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也正式启动实施。到今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

提起古籍保护工作,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经掀起过一阵高潮,举办了较多古籍鉴定及修复等培训班。遗憾的是,不到一年时间这项活动就偃旗息鼓了。”

古籍保护的再一次高潮就是时隔20年之后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次古籍保护是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有序推进的。尽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不是保护古籍的行政主管部门,但它被授予了一定的行政职能,如负责全国统一的中华古籍目录的创建、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中承担培训中心的工作、协同各省级中心做好研究工作等。此外,文化部办公厅还成立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以规范和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咨询、论证、评审和专业指导,促进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刘家真说。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介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就是摸清家底,也就是对全国进行古籍普查登记。截止2016年年底,该计划已经完成了对全国12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200余万部古籍的普查登记;编纂出版了涵盖全国119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30部57册。在中华古籍保护网上开设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目前已经累计上传发布了40多万条权威古籍普查数据,全部免费向社会公开共享。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以形成古籍分级管理体系。201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各收藏单位珍贵古籍的保护,带动各级、各地古籍库房条件的改善。”王雁行说。

在该计划开展过程中,公众最为关心的可能就是古籍的修复和保护了。“这包括对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原生性保护是修复古籍以延长其寿命,再生性保护则是对古籍进行数字化和影印整理出版。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对古籍的保护和利用。目前

所著的《齐民要术》记载:“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微相入技术,即书页破边边缘跟补纸边缘的纤维只能微搭,这样才能保证书的厚度不变。古籍修复也是个经验活,日复一日的拆书、洗书、补书、折页、喷水、剪页、压平、捶书等十余道工序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古籍修复师的最大财富。

但如今在国图古籍修复室,无论是老师傅还是年轻人,也都在拥抱新技术为古籍修复带来的便利。“比如对古籍纸张的成分进行鉴别,判断是麻纸、竹纸还是混料纸,以前的师傅用手一摸便知,但这手艺没个十年八年是学不出来的。即便学出来了,也有摸错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了显微镜,把书放在显微镜下,一下子就能鉴别出纸张的成分,还不会出错。”杜伟生说。

在修复室,还有一台类似于打印机的机器。杜伟生介绍说,这是一台“纸浆补书机”。用这台机器,几十秒就补好一页书。用机器修补古籍,一人一天可以修补40叶,相比之下,人工修补一件一级破损的古籍,一天只能修补1~4叶。“但机器虽好,却不是什么都做。”杜伟生补充道,“比如‘纸浆补书机’就不能修补缝隙,也不能修补跑墨掉色的古籍,有些工作机器还是代替不了的。”

除了增加修复机器外,国图下设的古籍保护科技重点实验室还在加紧解决修复技术难题。比如针对古籍酸化的问题,2015年,该实验室就对国外文献脱酸溶液、工艺路线和脱酸设备进行研究和改进,研制出无闪点、安全性更高的脱酸溶剂以及小型一体化批量脱酸试验机,有效实现了古籍脱酸。

“还有对纸张纤维、纸张酸碱度、纸张的拉力等指标的检测,对书库的空气检测等工作,原来都是需要请外面的公司来做,现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就可以做。”陈红彦介绍说。

但陈红彦也坦言,利用科技手段来进行古籍修复,国图现在仍处于初步阶段。“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先进的水平还差得很远。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的合作,也与国外同行建立交流机制,扩展我们的视野,借鉴已有的成果,促进古籍修复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进一步融合,相信会给古籍修复带来更好的前景。”

全国累计修复古籍约200万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着力建设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发布一万余种古籍影像资源,并将陆续发布新的古籍数字化成果。”王雁行介绍说。

该计划实施的十年间,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效果显著。在计划实施前,全国古籍修复专门人才不足百人,如今已扩大到千人。截至2016年年底,该计划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65期,建立了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2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我国还有很多珍贵古籍散落海外各国,古籍原本的回归不容易,但可以推进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王雁行介绍说,“2014年我们设立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及数字化合作项目,对海外古籍进行普查登记,与海外古籍收藏机构商议古籍数字化回归问题。比如,经与法国相关部门签署协议后,去年全部馆藏敦煌遗书以高清数字化形式实现了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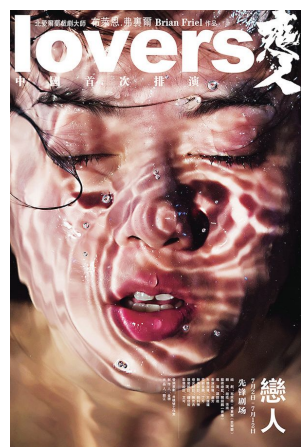
此外,该计划还通过举办展览、征文比赛、创客大赛等活动,向公众介绍古籍知识,提升公众对古籍保护的关注程度和兴趣。

2016年,“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当中。中华古籍保护,仍在继续。



郭刚制图

剧场



从一场挚爱看人性的自觉

——评话剧《恋人》
■ 么辰

作家契诃夫对爱情曾经有如此一段描述:“如果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恋人》的主题其实并不新鲜,一场有关天理与人欲的争斗。在爱尔兰作家布莱恩·弗里尔的构思下,全部戏大旨谈情,而在“情”的背后却蕴涵着巨大深刻的主题,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爱情在这里是一个主要的切入点,观众透过这个孔隙看到的是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双方:这边厢是宗教、礼法、世人的虚伪以及命运本身,那边厢是爱情所代表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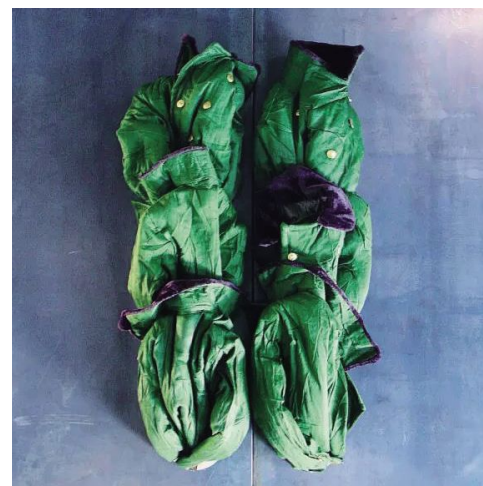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也许是人类最后一次思考天理与人欲的年代,人们用种种极端的反传统行为来撼撼着本已出现裂痕的思想观念,这使得60年代成为20世纪最为躁动不安的10年。第一部分“成”(winner)里面的主人公布伦南和玛格丽特是一对不到20岁并将于4周后结婚的恋人,玛格丽特的未婚先孕至少在当时还不够常见,这种身份使得他们从一出场就显示出了一丝叛逆的意味。这一天他们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以便应付迫在眉睫的考试,除此之外,这一天还具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

布伦南和玛格丽特有各自的烦恼,并且在性格、对人生的理解方面差异巨大,玛格丽特开朗活泼,布伦南内向稳重;玛格丽特更加实际,布伦南却耽于幻想。玛格丽特说:“上帝对待我们就像是坏小子对待一群苍蝇,只为了图个乐子。”而布伦南想的只是考取理学士,最后当一名数学老师,丝毫不考虑即将成立的家庭。除此之外,各自的家庭也会成为矛盾的引爆点,但是两人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宗教、礼法、世人的虚伪——这个敌人常常会成为两人吵架之后言归于好的和平使者,这对年轻的恋人正在与周遭的强敌做着单枪匹马的斗争。我喜欢这个话剧匠心独运的设计——另外两位演员通过旁白缓缓叙述着布伦南和玛格丽特的最终结局——溺水而死。与他们之间渐渐消弭矛盾,达成和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时传来的啾啾啾声预示着危险和死亡像一只黑狗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

小时候谈《孔乙己》,常常会纳闷于孔乙己是怎么死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总之是死了,这个结果就已胜过一切世界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他们的死因作者也没有明确交代,总之是死了。观众、旁白的演员都知道布伦南和玛格丽特会在这一天告别人世,命运往往只在当事人讳莫如深,这不禁让观众陷入沉思,他们如若知道今天会死,是否还会顾得上给予对方以深爱?

《恋人》的第二部分“败”(loser)演绎了一对爱情的恋人如何被世俗击败,美好的人性在虚假的宗教和虚伪的世人之中沉沦,变成了没有爱情的爱人,或者如村上春树所说,没有爱的做爱。安迪和汉娜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只是他们败给了世俗的风刀霜剑,大多数人却败给了时间的软磨硬泡,人性中的本真都在慢慢消磨。

全剧的最后一幕是失落的安迪独自坐在人去楼空的家里,一曲动听的Beautiful life响起,布伦南和玛格丽特在远处相互依偎,朝着他们最想去的那座岛屿眺望,这预示着两人生命之中的最后时刻——他们正在慢慢划向自己的幸福之地和死亡所在。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巴金的散文诗《日》中的一段话:“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作者不希望年轻的布伦南和玛格丽特变老,像安迪和汉娜一样沦于时间和惯性的俘虏,所以用最终的死亡换来了他们理想的永生,为其平凡的生命注入了一抹人性的耀眼光芒。



库奈里斯的《长白山》创作于2011年,是成两行纹在一块铁板上的6件军大衣。(库奈里斯曾在中国生活过两年,从北京到云南,走了很多地方,长白山是其一。)(周天整理)

声音

“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花哨的手段也需要更关注效果,否则难免会落入‘昙花一现’的结局。”

——北京上广“丢书大作战”3个月,被捡超过3次的书不足3%,一位市民如是评价。3个月前,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场“丢书大作战”活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1万本书被“丢”在地铁、航班和顺风车等交通工具上,希望呼吁更多人利用通勤时间“开卷”。3个月过去了,活动主办方新世相后台显示,4008本书仅被捡过1次,只有239本书被捡超过3次。其实,类似“奇”招呼人们养成阅读习惯的活动还有不少,比如有些主办方推出先交“订金”,一个月内读完4本书退钱;有些则在微信里建立阅读群,号召人群人每日打卡读同一本书。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奇”招效果却大多不理想。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办《朗读者》,那么多优美的文字就等在那里,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不办呢?”

——董卿如此回应她为何一定要做《朗读者》

的问题。今年的高雅文化类节目有着霸屏的态势,先是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读诗节目《见字如面》让观众连连称赞,后又有春节期间央视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口碑双丰收,同时还掀起了民众大规模的诗词热。主持人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中的沉着老练、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文化气质获得观众无数点赞。自2月18日起,央视再次发力,于每周六晚8点档推出由董卿担任制作人的力作《朗读者》。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优秀的文化类节目所带来的影响力、品牌美誉度、正向口碑将比娱乐综艺类节目更广泛持久。

“现在大部分演员片酬比制作费的70%都要多,这是违反了创作规律的。演员给50天的拍摄时间要拍四五十集,你凭什么同意?都是因为行业本身贪欲太重。”

——2月1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电视剧片业十佳表彰大会上,电视艺术界人士就“片酬”问题展开了讨论,凭借《北平无战事》《伪装者》《琅琊榜》等多部热播剧捧红了王凯等演员的侯鸿亮,坦言演员片酬高是因为行业本身贪欲太重。郑晓龙也

直言这与行业整体不成熟有关系,“现在大量的资金涌入,他们不会抓剧本,但是他们会抓演员,把钱给够,收视点就来了。我了解很多演员,他这部戏不想演,但是偏偏给你高价,那我为什么不拿呢?投资方不了解创作,就只能靠着演员去撑面子,然后去卖片。”

“这本小说想描述的道德问题就是,过去三十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听闻之后却仍然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曾如是解读自己的小说《试刊号》。2月18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发布埃科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试刊号》,这也是该小说中文版在大陆的首发。埃科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符号学家,其《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树敌》《密涅瓦火柴盒》《埃科谈文学》《矮人星上的矮人》等作品均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并广受好评。今年2月19日是埃科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作为《试刊号》的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新书发布会当日也为埃科举办了逝世周年纪念活动。

“我不只是保守,是非常保守。在意大利文里,‘保守’的本意是为了保存过去的一些伟大的东西,绝不是一种颓废;‘革命’也是为了先恢复到过去的辉煌,然后再次出发。”

——世界著名概念艺术家雅尼斯·库奈里斯如此解释自己近些年作品里的“保守”风格。意大利当地时间2月16日,这位被称为“贫穷艺术运动先驱之一”的艺术大师在罗马逝世,享年80岁。作为“贫穷艺术”的代表人物,库奈里斯的创作观念旨在反对创作中运用传统方法,主张“随心所欲”的创作,力求摆脱和冲破传统的“高雅”艺术的约束,并重新界定艺术的语言和观念。他以捡拾废旧品和日常材料作为表现媒介进行艺术创作,始终坚持朴素、自然、原始和人性的美学原则。他的作品大多表达自己对大规模城市符号、工业文明和个人价值的关注,后来发展为更为壮观的混合物,涉及绘画、拼贴、装置、雕塑、环境,甚至戏剧表演等多个领域。2011年,库奈里斯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演绎中国”是他在中国的首次个展。